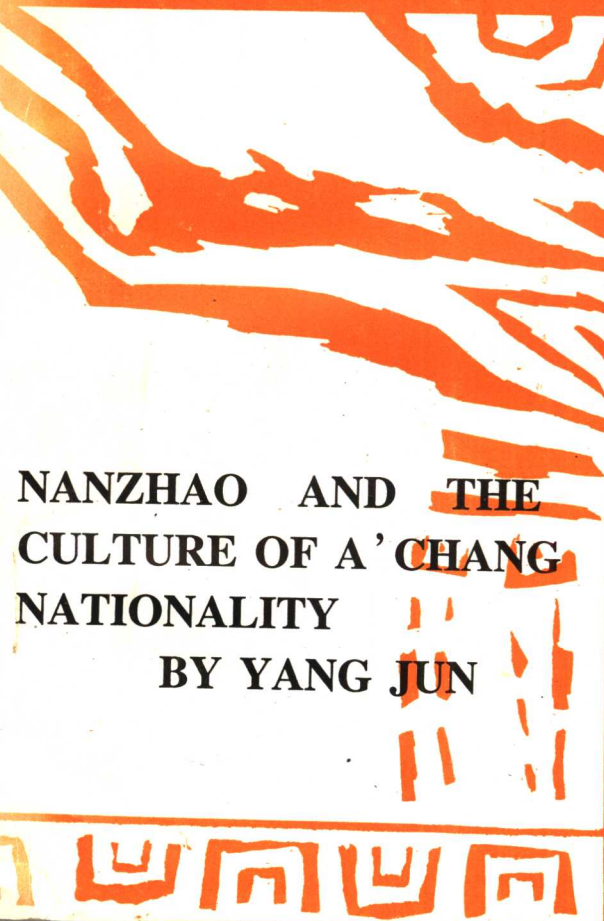


南诏与 阿昌族文化

杨 浚 著



NANZHAO AND THE
CULTURE OF A'CHANG
NATIONALITY

BY YANG JUN

德宏民族出版社

南诏与 阿昌族文化

· · ·



NANCHAO AND THE
CULTURE OF A CHANG
NATIONALITY

BY YAN JI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GRAPHY PRESS

南诏与阿昌族文化

杨 浚 著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 存阅

会员杨浚赠

一九九七、六、廿二

德宏民族出版社

(滇)新登字06号

责任编辑：童荣云

封面设计：闵如刚

南诏与阿昌族文化

杨 浚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德宏芒市青年路1号)

大理州电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144千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Q525-331-5/1·132 定价：12.50元

前 言

公元八世纪在云南洱海区域崛起的南诏王国的历史，浮现于表层的历史记载甚为繁多，唯独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南诏王室似乎早就当心后世对他们的族属作出“张冠李戴”错误结论。因此，留下一句“自言为哀牢之后”的记载，应该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线索，重要的信号。可是这哀牢人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族属？又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结果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回避这个问题，讳而不言，似乎不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以主观态度，匆忙作出结论，从而排斥其他论点，也是不恰当的。我认为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继续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众多的学说一齐涌现，纷陈于世，然后加以比较研究，择其理由充足，说服力强者而从之。总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如能排除其他诸多干扰，以客观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是一定能够获得合理解决的。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和调查研究，许多认识不了的难题往往会在人民群众的指点和启发下，获得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我在云南日报担任专职民族记者期间曾多次到过德宏州阿昌族地区采访，广泛接触阿昌族各阶层群众。在谈到他们的民族来源时，他们都自称是从澜沧江流域搬迁过去的，有的甚至指名是从大理州“蒙撒峒”地方搬来的。当时虽然引起了我的

极大兴趣，但我只作为一般的传说对待，并没把它与南诏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思考。

八十年代我回故乡云龙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出生地，远在唐代就被称为“细诺邓井”。此名起因前辈老人，也说不清楚，只说曾有叫“细诺邓氏族”的一个老妇人在这牧羊，由于她的羊群在山谷里舔食白色的结晶物，又特别喜饮那里流出的泉水，从而发现了食盐，开辟了“细诺邓井”，后来简称为“诺邓井”。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已找不到“细诺邓氏族”的踪影。考查现有的白族居民，包括我的祖先在内，都是在明代成化年间才从原浪穹县迁居到这里的，那末远在唐代就开辟了这个井的“细诺邓氏族”究竟是什么民族？这“细诺邓”与南诏始祖“细奴逻”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在我的脑海里又打上了一个大的问号？

此后，随着云龙漕涧早陶墓碑和康熙时云龙人董善庆《云龙记往》一书的先后发现；浪宋十二寨古浪人语言存在的启示；阿昌族“盐婆神老姆开辟盐井”传说的广泛流传。大量事实证明我的故乡白族聚居的云龙县，在古代竟是阿昌族先民古浪峨人繁衍生息的地方，而且北起兰坪南至云龙大栗树，西至澜怒两江流域，东到洱海周边区域竟是这个民族形成的中心区域，是一个阿昌族的发祥地，因而被明清史家称之为“古浪峨地”，又被称为“蒙氏之藪。”由此可见，它们与南诏的历史有着不可否认的紧密联系。

1985年我受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的委托，对大理州、德宏州和保山地区境内的阿昌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大量的地名资料，语言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使我更为深信，户拉撒地区自称的“蒙撒人”和云龙地区留下的“夏蒙撒”（意为“蒙撒人”的村落）以及巍山境内蒙舍诏的“蒙舍人”都指的是同一种人，而民间传说中的“蒙撒峒”实际上就是

史籍中所称的“蒙舍诏”。再看洱海区域西北部建立过“三浪诏”的所谓“浪人”，实际上也是古浪峨人中的不同族系的分支。但截止目前为止，这“浪人”是怎么来的？其来龙去脉如何？还很少有人加以深入的过问。

1989年在怒江州政协文史委的倡导和支持下，我们又对南诏浪峨人后裔进行了一次追踪考察。调查结果表明：南诏浪峨人后裔并非已湮灭无闻，相反他们还留下了不少幸存的子孙而且以不同的族称支系在滇西广大地区生活着。凡是南诏浪峨人后裔不论他们居住地区相隔多远，有的在金沙江以北，有的在洱海周边地区，有的在澜沧江流域，有的在怒江流域，有的在高黎贡山以西的小江流域，有的则远在德宏州梁河，陇川一带，他们之间早已失去联系，几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的语言竟是相同的，只有方言性的差异而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可是以他们的语言与凉山正宗的彝族语言相比则差异很大，基本上不能相通。这不论以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来考查，都说明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滇西地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区域。

无数迹象表明南诏浪峨人是一个包括繁多部落和支系的古代民族，他们的人口远比今天遗留下的后裔还庞大得多。南诏王国的灭亡，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失败的民族，随着历史的演变，他们都作了新的分化和组合。有的组成为阿昌族，有的组成为怒族，有的则仍以茶山、浪速、载瓦等自称的支系形式分散发展，后来被归并到景颇族之中。而很大一部分人则已分别融合和同化在白族、傈僳族、彝族和傣族之中。然而追本求源，他们都是从阿昌先民浪峨人中繁衍出来的。

南诏灭亡造成的重大损失莫过于王室上层部分800多人全遭屠杀。这是南诏最核心的，最有文化、最知情的那一部分人。此后他们的中下层官员或部落酋长，即便是有幸免于难的，也只

好率领族人逃亡到山区或边远地区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中断现象。

南诏是否给后继的大理国留下什么档案资料，我们无法知道，但是经历频繁的战乱，特别是明王朝征服云南以后，“凡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见《滇系》沐英传）。可以想见，那种“史随国亡，史随人亡”的文化中断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认为研究南诏的历史，继续重视古史籍文献资料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方面上，我们就无法前进，无法得出最科学最合理的结论。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外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似乎为我们展示了研究历史的新的方法和新的希望。我国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应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不仅可以为社会语言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提供许多一般史料中难以得到的重要论据。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代民族的社会思想，社会活动，都要在他们的语言中留下痕迹。反之，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着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上是长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的痕迹。

既然语言和社会历史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那末，以语言来解释历史和以历史来说明语言，显然是合乎情理，合乎科学研究方法的，决不能以古籍中找不到这样的记载为理由，而责难别人缺乏论据。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代越早，情况就越加扑朔迷离，模糊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论据的价值就越大。离开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就无法找到更为合理的途径。

同样，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着自己的地理词汇，而地理词汇

本身即是当时语言的反映。它一旦形成，也和语言一样具有稳固性。因此地名也和语言一样，对于弄清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在本书所收集的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都力图从社会语言学、地名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南诏与阿昌族的历史文化现象作出一些未为人们所注意的解释。虽然因限于水平，我的努力还远远不能达到全面恢复历史真象的目的，但我认为这一方法和道路是正确的，我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本书所记民族语言，均使用英语所采用的宽式国际音标，外加汉字注音。虽然不如语言工作者采用的窄式国际音标来得准确无误，但鉴于绝大多数读者并不普遍掌握窄式国际音标，为了普及的需要，只好采用宽式，外加汉字注音，希广大读者能给予谅解。

目 录

一、前言	
二、哀牢夷和南诏的族属	(1)
(1) 史籍记载的哀牢国	
(2) 从地名语言看哀牢国的族属	
(3) 哀牢人的东迁和南诏的崛起	
(4) 确定南诏族属供思考的若干问题	
三、阿昌族先民浪峨人在洱海区域的兴衰始末	(19)
(1) 六诏是浪峨人东迁后才形成的	
(2) 蒙俭的叛乱和蒙舍诏的胜利	
(3) 南诏浪峨人的优势	
(4) 南诏的衰亡及其教训	
(5) 南诏浪峨人子孙的下落	
(6) 阿昌族先民与白蛮之间的关系	
四、从语言看阿昌族的族源	(40)
五、试析“卢人”“卢鹿蛮”和“卢蛮”的区别	(51)
六、南诏的火葬习俗及其影响	(57)
七、南诏的宗教习俗面面观	(60)
八、泸水鲁掌欧家族属初考	(66)
九、兔峨等寨是怎样划归兰州的	(69)

十、云龙漕涧阿昌族情况调查·····	(71)
十一、阿昌族社会历史补充调查·····	(79)
(1) 阿昌族人口分布现状	
(2) 阿昌族的族源	
(3) 阿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4) 阿昌族对自然地理的选择	
(5) 阿昌族的婚姻习俗	
(6) 阿昌族的民族节日	
十二、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报告·····	(111)
(1) 追踪考察的动机	
(2) 被称为“蒙氏之藪”的古浪峨地	
(3) 浪峨人苗裔的演变状况	
(4) 明清以来的重大事件对阿昌族的影响	
(5) 浪峨人的古老遗风	
(6) 从语言看浪峨人苗裔的亲属关系	
(7) 考察后记	
十三、片古岗茶山人社会历史调查·····	(164)
十四、后记·····	(179)

CONTENTS

- I. prelude
- II. A study of the Branches of Ailao Yi' and Nanzhao
- III.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ang's People, the Ancesters of A'chang in Erhai
Region
- IV. A Dissertation on the Racial Origion of A'chang
by Viewing Through Its Language
- V. A Pilot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Lu-ren",
Lu-lu-man" and "Lu-man"
- VI. A Brief Survey of Agnate Clan of Ou Families in
Luzhang and Lushui
- VII. The Crematory Customs of Nanzhao and Its Influence
- VIII. All Aspects of Religious Customs of Nanzhao
- IX. How Were Tu'e Villages Put Under Lanzhou's
Administration

- X. A Research of the Conditions of A'chang in Chaojian,
Yunlong County
- XI.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A'chang People
- XII.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Pursuing the Trace of
Lang'e, The Descendents of Nanzhao
- XIII.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Chashan
People in Pianma, Gulang and Ganfan
- XIV. Postscript

哀牢夷和南诏的族属

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一）史籍记载的哀牢国

哀牢夷是秦汉时期活跃在澜沧江中上游一带的古老族群。他们在历史文献中给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九隆传说，使我们得知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曾经历过“只知有母，不复别父”的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东汉人杨终曾写过一篇《哀牢传》，可惜后来失传，但幸从其它史书转引中还保留下六十八个字的原文，叙述了哀牢国从禁高开始到扈栗的八代世系。

又据《后汉书》记载：扈栗于东汉建武十七年（时为公元41年）归顺汉朝。若以每代平均30年计，那末禁高生活的年代至少应在公元前二世纪秦末汉初之际。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哀牢夷已形成部落联盟的政治实体——哀牢国。

但从那次扈栗内附的情况看，据《后汉书》载：“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扈栗为君长”。可见那时哀牢国本部的人口并不太多，分布范围也不会太大。估计只占有澜沧江沿岸今云龙西部，

保山县东南部和永平县西部的这一片地区。

又从哀牢夷第二次内附的情况看，据《后汉书》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通鉴》卷四十五“汉纪”明帝下记载“永平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臣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始通博南山，度澜沧水”。

从前后两次内附的情况对比，那末，从公元41年到公元69年的28年间，哀牢国的户数净增了四万九千一百多户，人口净增了五十三万六千多人，说明他们有了重大的发展。但估计是由于他们归顺汉王朝以后，在本族和周边各民族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在第二次内附时，带动了周边各民族也跟着归顺汉王朝的。所以这时的哀牢国领域即使有所扩大，但其实际控制范围，仍然局限在哀牢、博南二县，即澜沧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仍比汉朝设置的永昌郡范围要小得多。

那末，这“哀牢夷”究竟是什么民族呢？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掸泰族，有的说是濮族（即后称的蒲蛮人）有的说是昆明族，有的甚至说是夜郎人在永昌建立的“西夜郎国。”

之所以形成众多的说法，主要是由于当时永昌郡地区，处在多种古老民族汇流的交结点上。

首先是澜沧江中上游地带为古浪峨人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他们就是后来阿昌、怒、独龙、茶山、浪速、载瓦等族系的先民。而澜沧江中下游地带包括今施甸、昌宁、永平、凤庆、云县一带则为濮人生存和活动的地区，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蒲蛮布朗、崩龙（现称“德昂”）佤等族系的先民。而在澜沧江和怒江以西，包括今龙陵、腾冲和德宏州境域内，又为鸠僚、僳耳、雕题、漆齿等族群活动的地区，一般认为他们就是后来掸傣民族的先民。

至于澜沧江以东直到洱海区域一带，则为昆明人生存和活动的地区，他们就是后来白蛮西洱河蛮、青蛉、弄棟等族群的先民，大部分演变为今天的白族。

由于永昌郡境内的保山一带，那时是著名的“金银宝货之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曾被后世称之为“沧怒两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又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所以不但汉王朝要决心开发，那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的各族部落酋长们也极力扩张势力，企图为本族开辟更为有利的生存空间。在此形势下，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各族群部落之间，有时和睦相处，呈现联合的趋势，有时兵戎相见，相互较量，以争夺地域控制权。但我认为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政治实体——“哀牢国”的出现，其中必有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成为这个政治实体的主体民族，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 从地名语言看哀牢国的族属

那末，在这古哀牢国的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民族是谁呢？我认为她们就是澜沧江的主人——浪峨人。

首先从地名学的角度看，古代民族常有以本族群或部落的名称来命名所在地及江河山湖的习惯。澜沧江在汉以前称“劳水”（又称“牢水”），“劳”、“牢”与“浪”语音对应，故“劳水”（牢水）实为“浪水”，即“牢人”或“浪人”居住的江城之意。汉以后，这条江城改称“澜沧水”，则读音更为直接，同样也是浪人居住的江城之意。现在浪峨人后裔中的茶山人称澜沧江为“来恰弄比”（Le tfa:n laŋ bi:）， “来恰”是茶山人的自称，“弄比”为大江之意。由此可知，澜沧江之名来自浪峨人的族称是符合实际的。

既然古代民族常有以本族族称来命名所在地山河的传统习惯。所以从地名反馈的信息中有理由认为“哀牢”与“浪峨”有密切关系。再从今天的民族自称与互称看，浪速人自称“来浪”，而茶山人则称浪速人为“浪峨”，载瓦人自称“载瓦”，而浪速人则仍称之为“勒浪”。潞西、梁河一带的阿昌族自称“浪瓦”，而“浪瓦”一名实导源于“浪峨”的异音。因此不论是阿昌、茶山、浪速、载瓦等族系都属于哀牢人的后裔，哀牢人也就是浪峨人，哀牢国灭亡之后，他的后裔并非消失了，而是逐渐演变为“浪峨”的。

2、我们已经知道哀牢人主要分布和活动的地区在澜沧中上游地带，而濮人（即蒲蛮人）分布和活动地区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带，哀牢人有沿江向南发展的趋势，而濮人则有循江向北发展的趋向。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即在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扈栗（又称贤栗）“曾遣兵乘葦船南攻鹿多，鹿多民弱小，将为所擒，会天大震雷，疾风暴雨，水为逆流葦船沉没，溺死者数千人。后扈栗复遣六王攻鹿多，鹿多王迎战，大破哀牢军，杀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惊怖引去。”（见《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段记载说明哀牢国两次向南扩张都遭到挫折和失败。虽然文献记载并未给我们指明鹿多人的族属，但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反思。

反思之一是：如果哀牢国是由濮人为主体的国家，而澜沧江是下游又是濮人的势力范围，那末哀牢国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向南扩张去攻打鹿多了。

反思之二是：假定鹿多人不属于濮族的族系，而又与哀牢对抗，哀牢国需去征服他们。但鹿多人所处的地盘是在澜沧江下游地带，是处在濮人的势力范围之内，那末哀牢人去征服他们，决不致于遭到孤军深入，多次失败的结果。

由此可知，哀牢国并非是以濮人（即蒲蛮人）为主体的建立的